



1937年江阴沉船（资料照片）

《大江东去》背后的宁波船帮

10月9日、10日，由宁波市演艺集团制作的原创话剧《大江东去》首演。该剧讲述了1937年宁波船商洪一龙在吴淞口炸船卫国的故事，塑造了宁波商人重信重义、敢闯敢拼，兼有家国情怀的男儿形象。是继甬剧《沈三江》后，舞台上又一部展现宁波商人形象的作品。

和《沈三江》不同，《大江东去》里的洪一龙没有特定原型，而是众多宁波商人形象的合体。导演李伯男说，希望观众看到这个戏时，想到的是整个宁波商帮的精神。

事实上，如剧中宁波人在外地开办钱庄，与洋人抗衡，投身造船业，依靠宁波同乡会、四明银行的作用在上海站稳脚跟，乃至剧终激动人心的炸船封江抵御外敌，在历史上都有迹可循。主角洪一龙背后，隐约还是能看出虞洽卿、叶澄衷、朱葆三等一代宁波船王的影子。本文试图撷取几个关键词，列举其事一二。

记者 顾嘉懿



炸船封江

《大江东去》中，宁波船商洪一龙眼见日寇企图侵占船厂，毅然决定将毕生心血——华威造船厂78艘轮船悉数列队吴淞口自沉，宁可将财产化为乌有，也不让日本人从中得利。最后一幕，洪一龙在漫天火光中慷慨陈词：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我不是军人，按说轮不到我毁家纾难，慷慨赴阵，可如今国将不国，我壮志难酬啊，为了救国我只得亲手毁了我的事业。”一席话令人热血沸腾。

事实上，确有宁波商人参与过此等大义凛然的壮举，他就是虞洽卿（1867~1945），慈溪人，中国近代民族轮船航运业创始人之一，拥有宁绍轮船公司、三北轮船公司、中意轮船公司等。

1937年，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航线西进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地方、战略要地江阴沉船封江。此举昂贵、笨拙，却得到了许多民族企业家的支持，比如虞洽卿、杜月笙。

这次沉船没有国民政府的指令，也没有人催促，完全是爱国商人考虑到上海安危而做出的自发行为，以致在后世资料中很难找到记载，只有两家公司的员工知道此事。

此后，虞洽卿的船只还参与了马当沉船、镇海口沉船、龙潭口沉船、宜昌沉船等多次行动。蒋介石

一生对虞洽卿十分敬重，不乏他为抗战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因。

据后人统计，虞洽卿所有的9万余吨船中，用来沉江的达4万余吨，另有2万余吨被日军炸毁，剩下的3万余吨除上海中意公司的1万多吨外，其余均在长江中上游武汉至重庆一带，投入到大西南的运输事业中。

关键词2

恒源钱庄

《大江东去》里的洪一龙少年时被于妈收养，在上海的恒源钱庄做事，很受器重，俨然是钱庄春风得意的少掌柜。

现实中，宁波人在外地开办钱庄的历史十分悠久，上海有不少“恒”字打头的钱庄都为宁波人所有。

据史料记载，宁波钱庄的兴起始于明中后期。万历年间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为工商业服务的金融机——钱庄业应运而生。其业务范围包括银两的评估、兑换，银两、银元与制钱的兑换，及银钱的保管、运送、汇兑、支付等。

宁波人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开设的“四大恒”十分有名，即恒利、恒兴、恒和、恒源四大钱庄，俨然有清廷外库的意思。晚清北京人要显示身份高贵，讲究“头顶马聚源，脚踩内联升，身穿瑞蚨祥，腰缠四大恒”，即腰缠万贯之意。

四大恒资本雄厚，信用良好，又多结交官僚富商，存放的款项大部分来自内务府和各旗籍官员。四大恒也向北京各大当铺发放贷款，成为主要为高官和富商服务的银号。

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北京各家的银号、钱庄惨遭浩劫。据说四大恒的白银，八国联军

用了三天时间才抢运完，四大恒从此销声匿迹。

清末民初，上海开埠，各地商人在沪按行业分帮。以钱庄业而言，有宁波帮、绍兴帮、本地帮、洞庭帮、镇江帮等。其中，以宁波帮独居其首。

当时，上海九大钱庄由宁波人开办的占到六家，分别为镇海的叶澄衷家、李也亭家、秦君安家、方伯椒家，和慈溪的严信厚家、董仰甫家，占上海钱庄业的半壁江山。有趣的是，这些钱庄在命名时，不少也以“恒”字打头，有着“和为贵、利为基、兴旺发达、源远流长、永恒于市”的内涵。

《大江东去》中洪一龙所在的“恒源钱庄”，处处体现出以顾客为先、为顾客负责的态度，是宁波帮钱庄的缩影。在乡情纽带下，主顾与店家良好互动，互通有无，寻找商机和投资的可能性，成为钱庄业兴旺多年的主要原因。

20世纪后，旧式钱庄历经多次金融风潮的打击，至1911年纷纷歇业，为新的金融机构取代。然而早期钱庄在为外商银行、洋行从事进出口贸易，流通中外商务资金，开创汇划制度，投资民族工商业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无法抹灭。

关键词3

宁波旅沪同乡会 和四明银行

剧中洪一龙多次遇到商业危机，编导有意无意会提到“宁波同乡会”和“四明银行”，让这股隐形的力量来解决问题。

同乡会与四明银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？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讲过一个故事。

1911年，航行沪甬之间的英商太古洋行北京轮，嫉妒虞洽卿任总经理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他同业竞争，突然降低轮船客票价，企图扼杀我国航业。

宁绍轮船为招徕顾客，不得不忍痛随之降低票价。太古洋行挟其雄厚资本，必欲挤倒宁绍公司而后快，使宁绍公司亏损日甚，有朝不保夕之势。

紧要关头，宁波旅沪同乡会创办人施帽青，激于义愤，致函宁绍公司，主张集合全体同乡之人力、财力，组织“宁绍公司航业维持会”与之相对，并自己捐银五百两为倡。6月，施君忧愤卒。9月，乡人继其遗志，开职员会，组“宁绍航业维持会”，集资补贴亏损。因为乡人的大力支持，英商无奈，不得不协议统一沪甬线航轮票价，使公司逐渐转危为安。以“宁绍航业维持会”名义推动的公债式的股票银35万两，反得添造新宁绍轮一艘。

经此一役，洋人对旅沪同乡会刮目相看，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地位，也就日益提高了。

事实上，许多在上海出名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家都是身兼多职，他们一面投资创办工商企业，一面经营金融事业，在人事上兼职交流，在资金上互补相辅，既推动了金融行业，又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。

1908年9月，以虞洽卿、朱葆三为首的宁波籍人士合股设立的四明银行就是这样一种存在。这是一家完全由宁波商人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，被视为宁波帮的金融根据地。

四明银行因信誉良好，很快成为上海最重要的14家银行之一。此外，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南三行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等的高层管理权也都掌握在宁波籍人士手中。

1934年，浙江兴业银行针对全国金融作出一份调查报告：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；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；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。而到1935年前后，由于官办银行加强对金融业的控制，宁波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势力逐渐萎顿了。

参考文献

《纪实虞洽卿》 楼鹏飞、方印华
《宁波帮钱庄在上海的兴起》 秦亢宗